

武陵文库系列丛书

王希辉 著



从马背到牛背： 散杂居蒙古族社会与文化变迁

——以重庆彭水向家坝村为考察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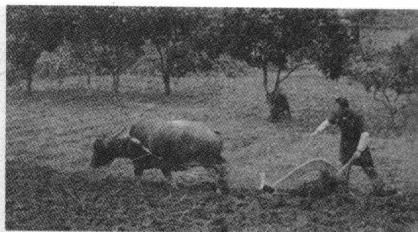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希辉 著



从马背到牛背： 散杂居蒙古族社会与文化变迁

——以重庆彭水向家坝村为考察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马背到牛背：散杂居蒙古族社会与文化变迁：以重庆彭水向家坝村为考察中心 / 王希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8

ISBN 978 - 7 - 5161 - 6483 - 9

I. ①从… II. ①王… III. ①蒙古族—社会生活—研究—中国 IV. ①K2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260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邓雨婷
责任印制 何艳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8.25
插页 2
字数 313 千字
定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近年来，散杂居民族研究已成为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出现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以下问题：第一是散杂居民族格局形成的机理和特点。我国散杂居民族格局有城市散杂居少数民族、农村散杂居少数民族和民族乡散杂居少数民族三种形态。由于受自然、社会、经济、政治、人口、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散杂居民族分布具有“广、多、杂、散、偏、弱”等基本特点，散杂居民族问题具有普遍性、广泛性、敏感性和联动性等明显特征，共生互补是散杂居民族关系格局形成的重要原因。第二是散杂居民族问题的应用研究。这类研究侧重于三个方面：一是对民族乡的研究，主要探究了民族乡的设置与历史演变、地位和作用，以及撤乡建镇与民族乡的治理等基本问题；二是对城市散杂居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研究，主要讨论了我国城市散杂居民族的分布、人口流动、文化融合、族群关系、社区功能以及城市民族工作等问题；三是对农村散杂居民族问题的研究，主要分析了农村散杂居民族的人口流动与生计转型、民族社会变迁与文化调适、民族文化村建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民族特色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保护等问题。

这些研究成果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初步建构了我国散杂居民族研究体系，推动了我国散杂居民族研究的发展，拓展了我国民族学学科研究领域。就武陵山区而言，学术界固然对白族、蒙古族、回族、瑶族等散杂居民族的社会文化进行了实地调查与研究，也出版或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但研究深度和广度还略显不够，尤其是对散杂居民族的生态变迁和文化遗产研究关注不足。有鉴于此，王希辉以武陵山区散杂居蒙古

族为研究对象,将环境变迁、生态适应与民族文化遗产问题紧密联系起来进行实地调研,写出了《从马背到牛背:散杂居蒙古族社会与文化变迁——以重庆彭水向家坝村为考察中心》一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前我国散杂居民族研究的缺陷和不足,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这部著作是作者近几年来研究成果的总结。作者通过对武陵山区散杂居蒙古族社会与文化进行田野调查,全面而系统地将散杂居蒙古族的经济生活、宗族治理、社会结构、宗教信仰、民族关系、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等日常生活内容详细记录下来,立意高远,视野开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高度。具体而言,我以为,本书具有如下突出价值。

首先,本书通过对武陵山区散杂居蒙古族的生计方式转型与文化选择进行深入调查与剖析,归纳和总结了移民族“本土化”和“农耕化”转换的内在原因及动力。这不仅发展了传统人类学经济文化类型与文化变迁理论,而且还丰富了我国蒙古学的研究内容,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武陵民族走廊”的理论建构与完善,有利于推动我国民族学学科理论的建设。

其次,本书以长期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真实再现了武陵山区散杂居蒙古族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现状,为相关政府部门民族政策的制定、扶贫开发、生态环境保护、民族文化保护与开发等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此外,本书在实地调研过程中,还十分注意收集散杂居蒙古族的集体记忆材料,有助于推动武陵山区散杂居民族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利用。

本书综合了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生态民族学与人类学文化变迁理论,将武陵山区散杂居民族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而言,本书都会拓展且突破相关学科的研究领域,字里行间既有高屋建瓴式的宏观洞见,又有日常生活的细微描写,创获良多。所论内容中,如下方面尤富创新意义。

首先是学术理论创新。伴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生态适应与文化调适的发生,本书在散杂居蒙古族个案调查与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并提炼出

“文化固守”的新概念，总结了散杂居民族文化固守实现的基本手段和主要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术界长期以来仅关注“文化变迁”而忽视客观存在的“文化固守”的缺陷和不足，是一种学术理论的创新。

其次是研究选题创新。本书对散杂居蒙古族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实地调研，这不仅为我国散杂居民族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和新个案，而且也有助于推进武陵民族走廊研究，选题新颖独到。

最后是研究领域创新。本书将散杂居蒙古族的生态变迁、社会适应与文化遗产问题结合起来，探讨了引起散杂居蒙古族文化发生变迁的内外原因以及动力，总结了处于“文化孤岛”的散杂居蒙古族的文化选择与文化适应的内在机制。这就拓宽了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具有创新性。

本书在作为博士学位论文提交评审时，就获得了校外盲评专家的好评，并给予了很高的分数，答辩时也以全优通过。例如有校外专家评价道：“作者对蒙古族人的居住、生产、生活、习俗、信仰均有全面的把握，体现出该文是一篇长期雕琢而成的态度严谨的论文。作者善于运用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加上田野调查的自身感受，使本文具有较强的科学化倾向。尤其是作者将民族文化问题统摄到文化变迁与文化固守的大框架下，除了关注文化变迁的表现形式、变迁原因、变迁的动力机制外，尤其注重文化固守的基本内涵、实现形式、基本特征以及价值取向的追究，这是本书的最具新意之处。”

希辉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习了三年，为人、为学皆优。他勤于耕耘，善于思考，乐于分享，读博期间形成了良好的学术素养。同时，他也愿意将所学、所作与社会问题相联系，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有益于地方社会与文化建设。这种学术责任感是我们历史学者经世致用优良传统的体现，也是我非常赞赏的。

如今，在书稿即将付梓之际，我作为本书的最早读者，非常高兴为之作序。我认为希辉所做的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工作，书中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观点，在散杂居民族社会与文化研究领域，做出了新的贡献。本书虽然在诸多方面发挥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但是散杂居民族研究需要探讨和阐述

的问题仍然很多，不是一部著作所能解决的。期待希辉在这一领域继续努力，以本书为基础，将这一课题深入研究下去，站在时代的高度，取得更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姚伟钧

2015 年春于武昌桂子山

序 二

“文化固守”与文化自觉

很感谢希辉博士的抬举，让我有机会写序，这还是生平第一次。在我看来，给别人写序的人，一定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要么就是行家里手、资格老道，而我很难算得上，所以心里很是惶恐，又却之不恭，只好写两句，也借此机会，任性地说一下自己对学术的理解。

我与希辉相识、相交近10年。当时，他与同为恩施土家族农家学子、也都是毕业于湖北民族学院的陈沛照老师一起在广西民族大学读硕士时，我们就常常在一起交流，虽然我没有亲自指导他们，但关系很不错，时常往来。毕业后，希辉就联系到重庆长江师范学院工作至今，从一个土家族农家子弟，成长为大学老师，且已评上高级职称，获得博士学位，实乃可喜可贺。

出于学术交流及怀旧目的，希辉好几次邀请我前往重庆市考察。大概是2008年吧，具体记不大清了，终于成行，这也是我第一次去重庆，看三峡，尽管看的更多的是水库与大坝，但也给我以震撼。后来我们又多次在会议上碰面。有次可能是2012年前后我们还专门从武汉绕道怀化，在怀化学院姜又春兄的带领下，考察了好几处抗战遗址。也驱车从重庆到贵州的铜仁等地。正是这些经历，我才有了一些更为深刻的学术感想，也更明白为什么杨承志先生讲“民族学是靠人的两条腿走出来”的道理。

2008年以来，我去得最多的可能就是西南山地民族聚居区这块，学习了贵州、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等地兄弟院校的科研着力点，以及地方政府在重构民族文化方面所做出的诸多努力，并于2014年在

《思想战线》第5期发表了《对文化复杂性的认知:基于中国西南地方文化抒写讨论》一文,讲出了自己关于民族文化认知及现代民族志书写的一些粗浅看法,借此再次感谢希辉、沛照等的帮助与引导。

民族学、人类学如何认知社会或某一群体?毫无疑问就是借助民族志来反映出其文化或者社会结构的独特之处。高丙中老师曾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发表过《关于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一文,里面对民族志写作方式讲得就很清楚。现在我们大多采用的还是马林诺夫斯基倡导的“科学的或规范的民族志”,对文化各部分描述完整,方法得当,最后还要有所升华。从这一点来看,希辉这篇民族志写的就很是标准。

作者从重庆市蒙古族入手,以向家坝村为例,讨论了自元以来重庆蒙古族的社会文化变迁,内容很是全面,在此不必赘述。方法上也很规范,如文献法、文化遗存考证、参与观察等,资料运用得当,可看出笔者的专业功底,以及学科研究方面的娴熟。

记得希辉在工作初始及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就跟我谈及过对重庆蒙古族研究的问题,我当时还不是很看重这样的选题。建议他在学术初发时应注重区域内主体民族或主导文化特征的研究。当时我们还讨论过关于乌江流域族群研究等话题。现在看来,希辉不仅选对了题,而且有了标志性的成果,也绕开了西南山地民族研究的一些成熟话题,弥补了一些研究空白点。从他的这个成果我也悟出了一个道理:虽然中国的56个民族都有着其主要聚居地,但是在任何一个地域研究某一个民族都是合理的,也是有可能的。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始终处在一个不断迁徙、交流、融合、共同繁荣的过程,这么一个特征在信息化、城市化不断加速的今天,表现得更为明显。

蒙古族可说是入主中原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如同中国历史上各个大一统王朝,为了保持帝国的统一与安全,总会派军队、官员、普通百姓来“镇守”边疆地区,这么一个特征在中国西南这一块表现得特别突出。较为明显的几个案例如秦始皇派50万大军征岭南,令赵佗率领50万秦军长期驻扎岭南,在那里生活、繁衍后代;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派30万大军进攻西南,消灭了元朝残余势力,并把军队留在云贵地区,又下令将留戍者的父母妻子儿女全部送到戍地。在当地,军队的驻防地称为“屯”,移民的居住地称为“堡”,他们的后裔就成为今天

居住在贵州安顺的“屯堡人”，等等。重庆的蒙古族大致也是同样的原因，这一点希辉的论著中已交代得很清楚。

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准确把握这些族群特有的文化习俗，以及其在长时期的历史过程中的文化变迁。以重庆蒙古族为例，希辉将之概括为“从马背到牛背”，我以为较为准确。马背为游牧，牛背为农耕，以主要生产工具来概括文化变迁，既形象又凝练。当然，同为西南山地民族，重庆是高山大川，与云南、贵州一些少数民族“刀耕火种”式的游耕又有很大的不同，很可惜，希辉在这里没有着笔，少了一点比较视角。这可能与他从“散杂居民族”研究的视角切入有关。

关于散杂居民族的研究，希辉在书中交代得很清楚，这可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里的一个典型特征。特别是在城镇化加速的今天，更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城镇化有着同质性，但是更多的民族在城市生活、工作、定居，其在文化方面有没有异质性？窃以为，中国的城镇化要避免千城一面的窘境，传承与弘扬民族文化便不失为好的路子。

这便涉及希辉在书中讨论的文化固守问题，实际上这也是作者的点题之处。即作者所说的文化“向后”研究视角。“学术界往往关注到并较多地对社会与文化变迁进行了系统研究，发表或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这值得肯定。但是，在笔者看来，已有的社会与文化变迁研究的价值维度多是‘向前’，即主要探讨已有的变迁或变化对社会与文化的未来发展产生什么影响、怎样影响和产生什么后果以及要如何应对等，却往往忽视了一种‘向后’的新的研究视角，即在已有变迁和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与文化体系仍然存在维持‘相对稳定的状态’的文化固守，已有研究缺乏对这种文化固守的内在原因、动力机制、基本特性、对文化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影响等内容的深入研究和把握，更缺乏对文化固守理论的建构和梳理，这是当前学术界研究中的明显不足”。

从本书来看，从马背到牛背，居于重庆的蒙古族生计方式已有了质的变迁，据理讲其文化也有根本转型。但是事实上，其文化的某些层面如信仰、习俗等，反倒有所强化。希辉将这一文化事象称作“文化相对稳定状态”，其原因就在于人们对文化的“固守”。

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整个社会在讨论中国社会改革与发展时，当时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超稳定结构”，或者历史上形成的中国人的“文化积淀”，即某些文化传统积淀为民族心理，成为某

种自然而然的生活习惯。在此,也不便于讨论这么宏大的问题,仅想就“固守”说说。

在谈及文化传承时,人类学通常用“文化濡化”来表述与解释,希辉博士以及一些学者用了“文化固守”这个词。希辉原来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为什么要用“固守”,我们学报没敢采用,当时我觉得文章还不大成熟,还需要找出更多的文化事象来支撑。今天借此机会,我再谈谈,以便与希辉博士讨教。

文化濡化指的是文化一代接一代地传承,其采用的方式通常是“教化”,譬如“叨陪鲤对”式的日常生活中的潜移默化,读书、考试、毕业等正规的学校教育,口传心授式的师徒传承,等等。其或多或少地都有着“文化自觉”在里面,有着主动、积极的因素。按我的理解,也不知对不对、妥不妥,“文化固守”应是不得已而为之,虽然也有一定的文化自觉,但更多的是“文化责任”、“文化担当”,即一定要这样,要不然就愧对祖宗,难容于天地之间。这样的文化现象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常常能够见到,尤其是在中国人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理由是,大凡有文化常识的人都懂得,西方人是敬上帝,人人一律平等;而中国人是敬祖宗,一定要把老祖宗的基因、文化传下去。当然,希辉对之解释的立意更高,“即对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史和文化体系进行重构,以及对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文化现象和文化内容进行去伪存真的鉴别”。但是,我觉得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固守”之意便难以解释清楚。

从价值观上来讲,鲁迅先生笔下曾有个“九斤老太”,是老一代保守思想的代表人物,盲目留恋过去的一切。在近代中国激烈变动的时代,这样的“顽固派”比比皆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我那会儿在上大学,有一个系列丛书,叫作“走向未来”,里面就讲到了许多这样的文化现象。我现在还记得一个例子,说的是当年英国人在上海市修了一条20公里长的铁路,但是当地的遗老乡绅们,觉得火车整天轰隆隆地叫,惊扰了地下祖先的清静,最后凑钱把铁路权买了回来,拆掉了。当然这可说是个极端的例子,但也表明文化的“固守”,应有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意义与价值。从积极方面看,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承接与发展,在保护与传承人类文化多样性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从消极方面看,就是排斥新生事物,拒绝变革,势必被历史所淘汰。

希辉在著作里讲的显然是积极的“固守”,其笔下蒙古族对自己的文

化有着深深的眷恋与自豪感。我想正是这样的“文化固守”，中华文明才持续不断，绵绵不绝，才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动荡与转型中，给人以脱胎换骨而又似曾相识之感，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所在。

秦红增

2015年4月于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畔

目 录

导言	(1)
一 选题缘由与背景	(1)
二 研究目标、研究路径与基本方法	(2)
三 研究意义和研究价值	(5)
四 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	(5)
五 散杂居民族研究述评	(6)
六 重庆蒙古族研究综述	(21)
第一章 重庆蒙古族的散杂居特征及田野点概况	(28)
第一节 重庆蒙古族的族属认定及来源	(28)
一 民族识别与族属认定	(28)
二 民族来源与人口分布	(31)
第二节 重庆蒙古族的散杂居特征	(36)
第三节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少数民族简况	(38)
一 民族来源	(39)
二 民族分布	(42)
三 民族人口	(43)
四 民族关系	(45)
第四节 彭水自治县鹿鸣乡向家村基本情况简介	(49)
一 鹿鸣乡基本情况	(49)
二 向家坝村基本概况	(50)

第二章 土地制度与经济生活变迁	(52)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重庆蒙古族的经济生活	(52)
第二节 重庆蒙古族经济生活的现代变迁	(55)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向家坝村的土地制度变革	(55)
二 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	(66)
三 职业多样化与家庭收入方式转变	(92)
本章小结	(95)
第三章 血缘、宗族与乡村社会建设	(96)
第一节 血缘与宗族制度的演变	(96)
第二节 村民自治与乡村社会治理	(103)
一 村民自治的历史进程	(104)
二 村民自治与乡村社会建设	(105)
本章小结	(108)
第四章 婚姻与家庭制度	(110)
第一节 婚姻制度的演变	(110)
一 蒙古族传统婚姻形式	(111)
二 重庆蒙古族的婚姻形式	(113)
三 重庆蒙古族婚姻习俗的演变	(118)
第二节 家庭制度的变迁与发展	(131)
一 家庭结构的变动	(132)
二 家庭规模的缩小	(137)
三 家庭功能的变迁	(141)
本章小结	(149)
第五章 民族教育与文化传承	(151)
第一节 家庭教育	(151)
一 道德教育	(151)
二 劳动技能教育	(152)
三 审美教育	(153)
四 民族文化知识教育	(154)

五 其他方面的教育	(154)
第二节 社会教育	(154)
第三节 学校教育	(155)
一 新中国成立前的学校教育	(155)
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蒙古族教育	(156)
本章小结	(159)
第六章 民间宗教与丧葬文化	(160)
第一节 民间宗教与信仰文化	(160)
第二节 丧葬文化	(169)
本章小结	(173)
第七章 地域、文化与认同	(174)
第一节 地域认同	(175)
一 族源地:对北方草原的追溯与认同	(176)
二 居住地:对重庆向家坝的认同和热爱	(178)
第二节 民族文化认同	(181)
一 对民族历史的关注与强调	(182)
二 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和追溯	(186)
三 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强调和重视	(190)
第三节 国家认同	(194)
本章小结	(198)
第八章 文化遗存与民族记忆	(199)
第一节 象鼻塞洞与象鼻塞碑	(200)
一 碑刻基本情况及内容	(200)
二 立碑的原因与历史背景	(203)
三 学术意义和研究价值	(204)
第二节 八角庙文化遗址	(205)
第三节 擗刀洞遗址	(207)
一 《擗刀洞记》的基本内容	(207)
二 《擗刀洞记》考释	(209)

第四节 清代墓碑	(211)
一 张人龙墓碑	(211)
二 张人龙妻许氏墓碑	(212)
三 张学鲁墓碑	(213)
四 张桂墓碑	(214)
五 张柄妻黄氏墓碑	(214)
六 谭世武墓碑	(215)
七 张经墓碑	(215)
八 张志立墓碑	(215)
九 谭珏墓碑	(216)
第五节 军事活动遗址及其他	(217)
一 箭池和马道子遗址	(217)
二 清代寿匾	(218)
本章小结	(219)
第九章 风俗习惯	(220)
第一节 服饰习俗	(220)
一 蒙古族的传统服饰	(221)
二 重庆蒙古族服饰的演变	(222)
第二节 饮食习俗	(225)
一 蒙古族的传统饮食	(225)
二 重庆蒙古族的饮食变迁	(226)
第三节 居住习俗	(229)
一 蒙古族的传统居住文化	(229)
二 重庆蒙古族居住文化的变革	(230)
第四节 出行与交通习俗	(233)
第五节 节日习俗	(236)
一 蒙古族的传统节日习俗	(236)
二 重庆蒙古族的节日文化	(237)
第六节 其他习俗	(239)
本章小结	(241)

结论:文化固守的理性思考	(242)
一 “固”、“守”与“文化固守”的词源学解释	(243)
二 文化固守的分类及主要实现形式	(244)
三 文化固守的基本特征	(250)
四 文化固守理论建构的基本价值取向	(254)
参考文献	(258)
附录 重庆向家坝蒙古族调查问卷	(267)
后记	(271)